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陈锋 主编 洪均 副主编

2014 年卷

陈 锋 主编 洪 均 副主编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4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4 年卷 / 陈锋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249 - 0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
②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F129②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10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398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口述史:唐代父老的特殊历史记忆	焦 露(1)
从明清时期泗港纠纷看江汉平原水事纠纷的特征	王 红(10)
明清漕运与灌溉用水之争	
——以豫北百泉、小丹河、洹水为例	刘建伟(29)
移民·耕读·仕宦:明清时代一个山东中型宗族的发展历程	
——以汶南黄氏为中心	王嘉乐(68)
明代江西人口流移探析	刘生文 廖艳彬(86)
行医救人	
——明代职业女医谈允贤研究	王超群(98)
清代鄂西南山区田土纠纷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变动	
.....	陈新立(114)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朝玻璃厂制器	朱晓燕(125)
清末民初中俄茶叶贸易与汉口茶市的发展(1862—1919)	
.....	刁 莉 邵婷婷(151)
晚清财政说明书的编纂与价值	陈 典 陈 锋(163)
晚清基层民众阅报风气的形成	
——基于阅报会与阅报社的分析	王美英 袁 静(201)
晚清杂税的征收特征	王 燕(212)
张之洞与晚清教案	
——以湖北教案为中心	吴剑杰(235)
清末民初河南的县财政与地方教育(1901—1927)	岁有生(251)
近代羊楼洞女性的工作、生活与日常	路彩霞(282)

乡籍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试论湖北省四川商会的兴起	魏文享(295)
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刍议	杨国安(312)
陈友谅研究述论	严忠良(327)
明代盐商守支问题研究综述	高一伟(338)
明清老人问题研究综述	张 绪(345)
20 世纪以来的清代河官与河政问题研究综述	金诗灿(352)
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晚清武汉影像史料综述	刘文祥(374)

口述史：唐代父老的特殊历史记忆

焦 露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①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口述回忆，指人们回忆自己以前的经历和见闻的口述材料；二是口头传说，指那些以口碑形式流传了若干代的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②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前提：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采集各类资料，综合考察完成《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从资料长编做起，把存疑史料收集在《通鉴考异》中，以备后人查阅。口述史同时面临巨大挑战：“历史”真实性、传播“历史”载体主观意识、“历史”重新“被塑造”等。因此，坚持“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谨慎抉择。唐代父老是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具有德高望重的品行，又有上情下达的政治功能，成为基层乡里制度下非常重要的一支民间力量。唐代父老是“口述史”的主要载体，

① 广义口述史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口述史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做了探索，参见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孙丽萍《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参见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历史记忆,通常被记载为“父老云”“父老传”“父老曰”等,因此本文从这一视角探讨唐代父老在基层社会的作用。

一 口述史的代表

父老群体长期居于基层社会,对本地民俗风情、自然地理、人物变迁等再熟悉不过。他们对本地历史、地理、人文等情况的讲述,即是鲜明的口述史资料,这完全异于官修“历史”。从父老那里了解基层社会实情,又能收取代表着民众对待事物的观念和主观意识的奇闻逸事,别于官方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父老可以选择支持官方舆论,也可以形成自己的舆论,如“乡论”等,这种无形的力量对基层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兹列《太平广记》等有关资料于下:

表 1 唐代父老口述历史表征举例

题名	奇闻逸事	口述类型	出处
谭宜	潭子池的形成	潭子池来由	《仙传拾遗》卷 3, 第 40 页
绿珠井	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	绿珠井神效	《太平广记》卷 399, 第 3205 页
睥湖渔者	湖本睥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	睥州湖成因	《太平广记》卷 232, 第 1780 页
牙将子	唐东蜀大圣院有木像,制度瑰异	木像缘起	《太平广记》卷 115, 第 804 页
王子芝	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莫知其甲子	神人描述	《太平广记》卷 46, 第 288 页
张果	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	神人描述	《明皇杂录》卷下, 第 30 页
夏侯禎 麒麟女灵	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于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	山神显灵	《三水小牍》卷下, 第 12 页,《抱经堂丛书》,民国十二年北京直隶书局影印

表 1 所见的口述史包含神话故事的传播和景观历史形成两类,下面做具体的分析。

第一类,神话故事体系。《太平广记》主要记载神话故事、奇闻逸事等。父老充当着传播神话故事的媒介,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口述史的传播对象包括当地百姓、官吏和其他人,故其影响范围

十分广泛。从这一视角来看，父老所承载的不仅是历史记忆，还有对国家的支持。且不论传说孰是孰非，只要能将民众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国家才是最终目的，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二类，景观史学类。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后者是人类历史痕迹遗留的自然景观，也有二者融合的景观。^①“景观史学”缘起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历史地理学，贝克《历史学与地理学》一书就“景观地理学与历史学”做了详细解说。^②魏斌先生的《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一文也提及信仰物化景观。^③本文“景观史学”即借鉴于大家之作。唐代父老身处基层社会，对地方历史地理人文包括历代沿革等基本情况较为熟知。《旧唐书》卷191《方伎传·孙思邈传》载：

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④

材料中的“癸酉之岁”，经核对历史纪年表，当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照邻”即初唐四杰之卢照邻。鄱阳公主应为唐初人，未嫁先卒其邑就作废，当时长安光德坊已为官舍。上元元年（即咸亨五年，674），高宗特赐良马，孙思邈以鄱阳公主邑司以居。^⑤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长安父老的口述和历史印证，长安里坊、亭台楼阁的兴废恐难以为后人所熟知。在某种程度上，父老正是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

① 参见[英]怀特《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王思思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以不列颠群岛的景观为主，同时也涵盖了欧洲、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和帝国景观。以景观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为基础，重点关注乡村景观与历史的关系，并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艺术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规划学等学科收集了大量素材。赵世瑜：《文化景观学与史学研究的突破》，《史学理论与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0—123页。

② 参见[英]贝克《历史学与地理学》，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③ 参见魏斌《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6—64页。

④ 《旧唐书》卷191《方伎传·孙思邈传》，第5095页。

⑤ 同上。

验,通过独特的“文化传播渠道”,既能传承文明,又能促进文化多元发展。^①长安父老在传播地区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地方景观描绘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层累的景观史,这也为后世的《地理志》《地方志》的撰写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当然给书写者也造成了不少困惑,真假是非还需权衡抉择。因此,唐代父老对历史地理沿革、新陈代谢都相当了解,形成自我的一部“乡土志”。这是当时官修史书远远做不到的,如《旧唐书》从体例没有走出“自上而下”的撰写模式。《新唐书》虽采纳笔记小说等多方材料,内容远比《旧唐书》丰富,但可信度不及后者。

唐代父老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向上层传达民情也属此类。他们向上层反映的对象包括皇帝集团和官僚系统。诣阙是父老与朝廷直接接触的重要形式:《全唐文》卷664《与从史诏》云:“杨干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县,降雪尺馀,兼奏耆老等诣阙,请欲立碑……耆老等远诣阙庭,请立碑记,寻已允许。”^②又如《旧唐书·李纲传》载:“又讽父老诣阙请之,寻令复职。”^③父老利用这种完全不同于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以讽时政,共求国泰民安。此类虽然没有具体的言语记录,但是形式具备口述史载体功能,而基层的民生和民情由此送达中央,自然要少些干扰,可信度较高。

但是,天高皇帝远,父老更多向当地官员传达民情,祈求造福一方。《日知录》卷12《访恶》载:“《说苑》云:‘董安治于晋阳,问政于蹇老。’”^④即是例证。老人凭借特殊身份将基层民情反映给上级官员,并协助地方官员治理本土。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封007号载:“□讳寂,字僧空,陇西敦煌人也……高祖绪,魏任沁州和川县令;曾祖绍,齐朝任晋州岳阳县丞;祖恭,隋任铜□县长……繁文缛

① 比如对于古史传说,经过个人主观加工,就会变成另样的传说,参见邢义田《画为心声》,中华书局2011年版。该书则就诸多画史反映的类似同一故事的历史考察,对我们很有启发。

② 《全唐文》卷664《与从史诏》,第6752页。

③ 《旧唐书》卷62《李纲传》,第2375页;同书卷64《巢王元吉传》,第2420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2《访恶》,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47页。

藻，尚结讴谣；东箭南金，由傅耆旧。”^①此为唐初墓志，墓主名寂，陇西敦煌人，祖辈均为地方官吏，可谓世代家宦。其祖父恭在隋为官，政绩显然，耆旧传扬美德，对自身名誉身份地位等都产生很大影响。《新唐书·韦景骏传》载：

韦景骏，司农少卿弘机孙。中明经，神龙中，历肥乡令……景骏相地势，益南千步，因高筑郭，水至堤趾辄去，其北燥为腴田。又维槽以梁其上，而废长桥，功少费约，后遂为法。方河北饥，身巡闾里，劝人通有无，教导抚循，县民独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景骏后数年为赵州长史，道出肥乡，民喜，争奏酒食迎犒，有小儿亦在中。景骏曰：“方儿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旧恩，何故来？”对曰：“耆老为我言，学庐、馆舍、桥郭皆公所治，意公为古人，今幸亲见，所以来。”景骏为留终日。

上述材料记录了循吏韦景骏在官利民美事。他出身官僚家庭，以明经入仕。神龙年间历任肥乡县令，帮助当地百姓治理水患，挽救良田多数；又教导百姓安抚民情，任满离去，当地人民为其立石记功。数年之后他出任赵州长史，路经肥乡，百姓大喜，争相犒劳，小孩子“耆老为我言”一语道破肥乡百姓对其仁政的眷恋和感激之情。由此可见父老对地方治理和官员的政绩评介有很大影响，形成国家对官员监督体系的另一途径——口碑史。

综上所述，唐代父老的口述史表征随着时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父老在基层社会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历史记忆，不仅补充了国家正史修纂的遗漏和不足，也构建了自我的一种历史观念认同。

二 唐代父老口述史的本相

口述史虽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但作为基层社会的心声，是父老对当地史实、地理、山川的描述，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克罗齐说过

^①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封007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概有三：一是研究历史总是研究者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二是历史研究是由现实生活的需要激发起来的；三是历史是按现时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来思考和理解。^①虚实结合，故事记录 and 传播则是真实，前文所列《全唐诗》卷448《潭子池》即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对于父老“历史记忆”的特征和功能，同样适用，其影响颇深。

首先，父老对神仙故事知识体系的传播，推进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传播和延续当时之前的历史，为后世研究奠定基础；发展则是从文本的构建出发，如“老子”原是道家创始人形象，至中古时期变成“老子化胡经”等形象，这种文化的构建受时代和人们主观意识影响，使得原始形象从量变到质变。这与近年来学术界提倡的“文本分析”研究法类似。^②同时，唐代父老作为传播神仙故事的媒介，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死观。南朝范缜《神灭论》即是对鬼神理论的质疑与反对，引发了形神关系大论战。唐代人的生死观念则受儒家中庸的生死观影响，大多追求精神的永垂不朽。^③如此，唐代父老传播“神话故事”内容则与唐代诗人的生死理念基本吻合，这与中晚唐人们世俗化、人格化的信仰也基本一致。

其次，父老对当地景观的解说，间接加强国家统治，促进景观历史的丰富和传承。父老传承着本地的山川河流、人物事迹的变革，不仅为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的管理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和参考，而且增强了本地人之间的认同感。唐代尤其是远离长安中心的南方地区，仍然是诸多蛮夷和土著居民的聚居体，通过对父老一类实地考察和采访，官方更加了解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羁縻统治或针锋相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是重要的指南。《陈拾遗集》卷10《为建安王与安

① 参见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0页。

② 文本分析是指对文本的表示及其特征项的选取；文本分析是文本挖掘、信息检索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把从文本中抽取出的特征词进行量化来表示文本信息。文本分析法主要有“新批评、叙述法、符号学”三种，从文本的表层深入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

③ 参见沈文凡、赵丹《晚唐诗人李贺的生死观——兼论唐代诗人对生与死的理解与诠释》，《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第62—65页。

东诸军州书》载：

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建安郡王修宜致书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校官属等：比贼中频有人出来，异口同词……某先使人向营州，昨回，具得父老密状，云贼势穷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孙万斩营中，其声如雷，贼党离心，各以猜贰。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①

此书写作背景是高宗武周时期对营州逆贼作战，当地父老密状官军其城详情，为官方作战决策提供可靠情报。父老选择依靠官军，将重要的情报传递给朝廷，并且强调要继续观察敌情，才有胜算。军事作战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父老此举则是重要协助，形同今日的“情报员”。因此，父老口述敌情，密状以闻，影响重大，非同凡响。

实际上，父老群体不仅丰富地方景观历史，还承担着历史传承的使命。生祠即是典型的景观史。顾名思义，生祠是为活人立的祠堂。赵翼《陔馀丛考》卷32《生祠》载：

《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②

赵翼在此揭示了“生祠”源起于先秦时期。唐代对此项规定更为规范化。《唐律疏议》载：“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③又《日知录》称唐朝“当日碑祠之难得”^④。故知唐代对立生祠控制得相当严格，但是不影响生祠所立之后的现实影响和意义。当官员期满或者升迁之后，父老等所立的生祠就会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回忆，丰

① 《陈拾遗集》卷10《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② 赵翼：《陔馀丛考》卷32《生祠》，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90页。

③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11《职制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7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23《生碑》，第644页。

富民间文化,传承的载体——父老凭借着自身威望对后任给予警示,也表达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生祠”就具有了“纪念碑性”,再经由父老等口述传承,成为后世佳话,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巫鸿先生《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虽从美术史的角度解读传统艺术的精髓,但是将祠堂的纪念碑性诠释得透彻。^①父老凭借自身威望和特殊的社会地位,故能对景观历史丰富和遗传,促进文化的多元多样发展。

最后,父老对基层民情的传达,间接反映了国家与基层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父老阶层通过传达基层民众的心声,反映真实的社会底层现状,为统治者提出时政建议,促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发展。皇帝巡幸一方部分也是受到当地父老的邀请,使得基层民众沐浴皇恩,减免赋役等困苦;即使是国家动乱时,如安史之乱玄宗西逃蜀中,途中遇到当地父老献饼,聆听基层的心声,可谓感慨万分。带有半官方色彩的“父老”群体,在国家与基层之间的控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唐初父老主要实施精神教化,辅助里正加强对基层控制,巩固国家的大一统。贞观十五年(641)废省乡官,但父老仍存于乡里,继续发挥自身职能。盛唐又一大变:开元二十九年(741)设置“望乡”,实为父老的另类称呼。天宝十二载(753)改父老为耆寿,既是对老年的重视,也是盛唐国力的展示;父老职能扩大化:从精神领袖扩大至诸多领域中。中晚唐父老、耆寿等杂称,其职权范围更为宽泛:《唐会要》卷49“病坊”条:

会昌五年十一月,李德裕奏云:“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敕:“悲田养病坊……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②

^① 参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有关“纪念碑性”的研究参见氏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唐会要》卷49“病坊”条,第1011页。

会昌五年（845）十一月颁布此条敕令，正当武宗灭佛之际，材料中说“释教”悲田改为养病坊，实为朝廷打压佛教势力的举措。然于两京和诸州选拔耆寿担任养病坊职员，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可见其职能范围是扩大了。结合此时乡村社会的变化，里正、乡官地位的下降正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中晚唐“乡里制”到“村制度化”的变化时期，国家对乡里的控制逐渐减弱，父老在基层尤其是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更显重要，延至宋代父老职权范围有所变化，详见柳田节子和梁建国两位先生的文章。可见他们在基层远不止“敦俗教化”此类，尤其是唐代“村”制度的确立，村正、村老、乡老等人物的作用愈加明显，村聚落之下父老等形成自治集团，与国家行政区划作以“对立”和区别。这一点与王明珂先生所提出的“族群认同”理念类似。国家行政体系上将其纳入管理，而他们自身形成中心，对其他的集团表示独立或者对抗态度。

三 结语

唐代父老在基层的作用非常重要，国家依靠他们辅佐行政系统的末端——里正、村正等治理基层。唐代父老的职能是逐渐扩大了。在历史记忆上，父老对以往的神话传说、景观历史的构建与传承以及民情的上传等都有着重要的载体功能。以往的官方史书多以国家姿态评价基层社会，势必带着以大视小的眼光，而父老的“口述”历史功能恰好补充了前者的不足，不仅丰富了历史的内容，更是为基层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口述史”存有缺陷，我们需对“野史”资料采取谨慎态度，追寻历史真相。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

从明清时期泗港纠纷看 江汉平原水事纠纷的特征

王 红

泗港口，是汉江下游左岸^①的一个古分流穴口，是众多古分流穴口中的一个，位于潜江县“西北四十里”^②，“当在今天门市新泗港附近”^③，其口下支河名泗港河，“直趋景陵（亦称竟陵，今天门市）、汉川，出汉阳”。泗港口和泗港河究竟形成于何时，已不可考。明初，“有坛子湖、泗港、乾新口各支河分杀水势”^④，这是泗港口和泗港河最早的文字记载。

自明中叶始，江汉平原的洪涝渍灾害频发，水事纠纷连年，泗港纠纷首次爆发于明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1572—1574），在明万历年间密集发生，纠纷余绪一直持续到清嘉庆十二年（1807）被定为铁案时止，前后长达 236 年。泗港纠纷首开汉江下游古分流穴口大规模长时期开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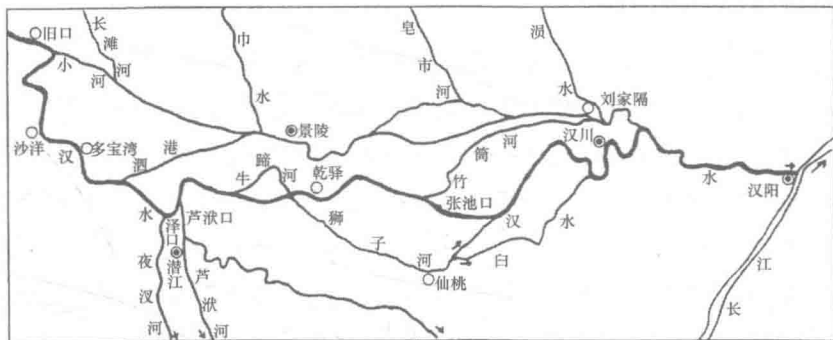
① 左岸，人们对江河两岸的习惯称呼，一般来说，背对河水来的方向，面向水流走的方向，左边为左岸，右边为右岸。由于平面地图以左为西，以右为东，因此，左岸亦叫西岸，右岸亦叫东岸。汉江的左岸或西岸，由于地处汉江以北，习惯称为“汉江北岸”；汉江右岸或东岸，由于地处汉江以南，习惯称为“汉江南岸”。汉江左岸或西岸的襄北平原，包括今之钟祥、京山、天门、汉川、孝感、黄陂、汉口等平原地区，汉江右岸或东岸的平原，位于汉江以南和长江荆江段之间，该稳固权且称为“江汉之间平原”，包括今荆门市、潜江市、仙桃市、江陵、监利、洪湖等平原地区。

② （康熙）《潜江县志》卷4《建置志·津渡·市镇》，方志集成本第46册（下同），第72页。

③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④ （康熙）《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第174页。

纠纷之始，是江汉平原著名的水利纠纷之一，基本上能够反映明清时期汉江下游防洪形势的严峻、水利纠纷的特征、江汉平原各种不同水利利益同盟之间的水利利益角逐，几可堪称明清时期汉江下游水利纠纷的缩影。然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①



明代汉水下游河道及其分流支河示意图^②

根据史籍记载，泗港纠纷主要属于天门县（亦称景陵、竟陵，今天门市）和潜江县（今潜江市）之间，即地方州县级行政区划之间的水利利益角逐。实际上，泗港纠纷所反映的地方基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因为，水利科学毕竟属于自然学科范围，其水事纠纷的利害双方的水利利益，不可能与人为划分的地方州县一级行政单位的范围完全吻合，其中夹杂着不同地缘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水利利益角逐，而且，水利利益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巧舌如簧，令人是非难辨；或竭尽能事，拉拢各种社会关系；或干

① 参见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65页，在“泗港口”的考证项下作一脚注，对泗港的开塞之争牵涉到天门籍的朝中高官——吏部尚书周嘉谟感到饶有趣味，因不属于此书讨论范畴，作者颇感遗憾；肖启荣在《明清时期汉水下游泗港 大小泽口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4辑（2008年），第101—114页）及其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8年4月，第137—146、149—150页）中，也提到泗港纠纷，但在对泗港纠纷进行水利利益集团划分时，沿用了明清时期一些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水利文献《襄堤成案》、《襄河水利案牍》的说法，称泗港纠纷为潜江县与天门县之间的利益争夺。

② 参见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脆强行开通或筑塞泗港口。因此,本文试图将水利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即从水利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明清时期泗港纠纷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一 显著的州县级行政区划特征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发生在明代的泗港纠纷共9次,而且全部集中在万历年间,发生在清代的泗港纠纷有5次,总共14次。

明嘉靖前,汉江干流下游有众多分流穴口分泄洪水,由于泥沙的自然淤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后,汉江下游干流的古分流穴口日渐减少,其中,泗港口、泗港河及与之相通的四汉湖“半淤浅平”。^①至明嘉靖中后期,汉江下游仅剩泗港口、小泽口、大泽口、牛蹄口四口分流,汉江洪水宣泄困难,洪涝渍灾害便频繁发生。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江、汉发生特大洪水时,汉江“诸堤半决,而枝河更多湮塞,民甚苦之”^②。水灾过后,无力恢复堤防工程,江汉平原便长期处于洪涝渍灾害的侵袭之下。明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1572—1574),朝廷批准兵科给事中刘铉的奏请,通过人力恢复长江荆江段和汉江下游段的分流穴口,大分大疏江汉,确保其分流态势,以缓解江汉平原的洪涝渍灾害。

首先,湖北省各级地方政府多次详细踏勘,分别对汉江沿岸的丁家河、张接港、黑流渡、渔泛、洚沙口、坛子口、泗港口、小河口等旧有分流穴口和新溃之陈洪口、谢家湾口等,对荆江沿岸的采穴口、油河口、调弦口、章卜穴、茹塘口、杨林口、柳港口、赤泊(又称赤剥)、新冲口等古穴口,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权衡了工程量大小、所需经费多少、现实开通的可能性和分流的必要性等多种因素,最终确定以人

① 《景陵县堤考略》,(万历)《湖广总志》卷33《水利志下·各郡堤防图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5册,第143页;另见(雍正)《湖广通志》卷20《水利》,清雍正十一年善本;另见(嘉庆)《湖北通志》卷25《政典八·堤堰·安陆府》,清嘉庆十年刻本。

② 《潜江县堤考略》,(万历)《湖广总志》卷33《水利志下·各郡堤防图考》,第143页;另见(雍正)《湖广通志》卷20《水利》,清雍正十一年善本;另见(嘉庆)《湖北通志》卷25《政典八·堤堰·安陆府》,清嘉庆十年刻本;另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4《湖广三》,绍文石印书局,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